

全球视野与中国经验

——第三届中国企业史研究 WORKSHOP 综述

周莹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企业不断迈向世界舞台。探索、总结既符合国情又与企业发展普遍规律相融合的企业管理方式和企业制度,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需要具备全球视野,还要积累和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和长期规律。为此,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联合举办“全球视野与中国经验——第三届中国企业史研究 WORKSHOP”,会议于2021年8月7—8日在线上顺利召开。开幕式上,内蒙古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张吉维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魏明孔研究员和福建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兼东南学术杂志社社长陈文章先后致辞,均表示本次会议对推动中国企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期望企业史研究更加繁荣。本次研讨会分九个专题,共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以及日本、美国和新加坡等43所海内外著名高校及科研机构的109名专家学者参会。

一、全球视野下的企业史研究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影响和依存逐渐加深。因此,只有从全球视野出发,才能真正发掘出企业史中的中国经验。“全球视野下的企业史研究”是这次会议的重要专题之一。中国商人不仅善于开拓国内市场,更是将中国企业的经营模式和文化根植于异国。龙登高(清华大学)指出在美华裔巴士的经营带动了美国主流大公司的效仿和改革,推动美国长途巴士行业焕发新生。余康(新加坡国立大学)以新加坡邱益昌公司为例提出合伙制不仅让邱氏米商集团的大米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也为其从货物进口商转型为银行家奠定了基础。冯国林(华中师范大学)认为甲午战争后朝鲜华商通顺泰通过多元化经营等策略保证了其在恶化的营商环境中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经营模式在近代对外资企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叶磊(中山大学)认为日资鸭绿江木材公司正是因为对本土生产模式的效仿与引入才得以落地和开展。李培德(香港大学)指出20世纪20—30年代味之素在拓展中国大陆市场的过程中,面对反日浪潮和民间效仿,不得不采取本土化的策略来保持竞争力。赵国壮(西南大学)发现中日战争背景下英资太古集团随着时代的变化及各种糖业力量的消长,不断调整糖品销售策略,适应市场的瞬息万变。

此外,杨乐华(德山大学)指出优衣库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入全程参与产业环节的一体化商业模式,为其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企业制度史研究

企业制度以企业产权制度为核心,包括企业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等各类制度,是保障企业有序运行和正常经营的基础。刘秋根、陈贺(河北大学)探究了大玉川及祁县茶商的经营、金融及企业组

织等问题,指出山西茶商建立的制度阻碍了技术进步和经营理念的更新。周黎安(北京大学)考察了钱庄与票号的治理模式与组织形式的不同特征,并对这种治理模式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高超群(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大生纱厂的设立为例梳理了近代中国企业产权制度的变迁,并强调了国家立法与民间商业习俗的张力对产权形成和界定的影响。

李蔚暄(复旦大学)指出就科层化角度而言,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在1945—1949年达到了其最高水平,但因管理能力不足、劳资矛盾等使科层管理制度效果不佳。于之伟(辽宁社会科学院)发现1959—1963年鞍钢职工代表大会并没有实际参与管理企业,更多地扮演了发动工人实现国家任务指标的生产动员大会的角色。李涛、李楠(复旦大学)发现近代面向发达经济体出口的机会扩张,促使企业注重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进而造成童工雇佣人数和雇佣比重的下降。隋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近代无锡工商业发展水平较高但又不够高的外部社会经济条件,导致经营式农业的高风险和高运营成本。雷鸣(南开大学)证明“工头+包身工制”有效解决了近代棉纺织企业扩张生产中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三、企业史研究:资料与方法

资料是开展企业史研究的基础,如何收集、运用资料以及判断其价值是极为重要的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档案被挖掘整理,如何科学利用这些资料成为研究者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兰日旭(中央财经大学)以本溪湖煤铁公司资料为例,分享了整理与研究这些资料的经验和其可能的学术价值。徐有威(上海大学)指出搜集与整理民间文献是三线建设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方法与范式的自觉反思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武亚军(北京大学)倡导在中国开展和复兴“通晓历史的战略研究”,进而促动中国战略管理学术成果的产生和当代战略管理理论范式转型。林立强(福建师范大学)重新审视了“企业史研究管理学范式是什么”,并指出企业史学科尚处于“前范式时期”向“常规科学”过渡的阶段。曲冠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总结了国内企业史研究的几种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四、跨学科的企业史研究

从管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视角探讨企业史问题是企业史研究的重要领域。陈凌、谢惊晶(浙江大学)和林盼(中国社会科学院)均以小说为主要资料,分别探讨了商业家族的变迁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企业管理机制的问题。陈澍(同济大学)聚焦于桑塔纳国产化的第一个阶段,回答了中国各级政府、大众集团等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等问题。封凯栋(北京大学)指出工程师主导型企业在复杂产品系统领域里能实现赶超得益于深刻的制度因素。巫云仙、陈芑名(中国政法大学)发现中国隐形冠军企业的技术创新路径大致是从引进和模仿开始,最后走上自主创新和始创创新之路。李书杰(中共中央党校)指出当前企业全面实施新型学徒制的过程中,应当重视校企合作关系,借助实际生产环境提升学徒技能。

五、企业家研究

企业家是推动企业发展和创新的重要要素。朱江(江苏省南通市档案馆)认为吴寄尘不仅是一位有突出贡献的近代企业家,也是热心公益的慈善家和传统文化的守护者。黄蕾(闽江学院)认为近代华资银行家不仅是近代经济和金融体系构建的核心力量,还曾对国家重大内政外交事务发挥重要影响。周孜正(华南师范大学)探讨了清末民初无锡民族工业的数个“乡土资本家”对无锡城市新气质的塑造。邵钢锋(南京大学)指出晚清杭州商学会以分散化和多元化的方式,对晚清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了有效补充。曾召金(昆山杜克大学)通过介绍山西保晋公司和冶金工程技术专家代表陆达,指出近代中国工厂被嵌入了一个由本地产业精英构成的动态网络之中。

六、企业史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是企业史研究的基础。本次研讨会共有四个主题以企业史案例分析为中心。

(一) 政府与企业

李玉(南京大学)通过20世纪20年代招商局应对租界、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干涉的几个案例,指出招商局与政府之间从合作博弈向非合作博弈的过渡。崔馨、杜丽红(中山大学)通过考证19世纪漠河金矿的基本情况,指出该时期漠河金矿实则为官办企业。白进伟(华中师范大学)研究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江苏省政府整理大生纺织公司案。陈颖佳(卫斯理大学)认为1882—1955年中国电力工业已成为国家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段志鹏(山西大学)以山西民营企业为例考察了战后国民政府接收处理民营企业的一种特殊方式。魏晓锴(山西大学)以太原重型机器厂为例考察了新中国自主建设重工业的经验与教训。

此外,路乾(中央财经大学)通过梳理19世纪早期美国各州法人组织开放准入的历程,说明了对组织准入限制的诸多危害。

(二) 国有企业研究

国有企业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属性和经济地位,其治理模式、管理体制、政策目标等也随之调整和演变。熊金武(中国政法大学)以天津航道局为中心考察了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的变迁历程。黑广菊(天津财经大学)认为尽管天津造币总厂并未扭转币制混乱的现象,但推进了近代中国货币制度的变迁,还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天津金融市场秩序。魏众(中国社会科学院)梳理了体制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和诸多重要措施。吴赟(德山大学)分析了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对日本、美国及西欧管理经验的认识和引进过程。

周小兰(华南师范大学)考察了19世纪上半叶法兰西银行创办的基本过程、及其与政府的博弈以及确立中央银行制度的经历。夏晨啸(大阪大学)梳理了1868—1952年日本国有企业在日本及其殖民地的发展历程。

(三) 行业史视阈下的企业史研究

王锐(北京大学)梳理了1931—2020年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历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医药产业的发展模式。徐玉琴(明治大学)对比了1970—2020年中日制药公司研发创新战略的发展情况。刘群艺(北京大学)梳理了青岛饮料业形成过程,并探讨了产业路径依赖中可能出现的政策冲击。赵晋(华东师范大学)通过考察20世纪50年代上海火柴业的产销变动解释了诸多轻工业生产过剩、产销失衡的问题并未随计划体制建立而终结的原因。李佳佳(湖北大学)以棉业统制局为分界点梳理了中国近代轧棉业的发展历程及每个阶段的特征。

(四) 企业经营

孙丽(安徽师范大学)、袁为鹏(上海交通大学)通过研究晚清黟县徽商同和、兆成号的史料,论证了商号合伙经营的稳健性特征。梁善明(陕西师范大学)分析了全面抗战前广西省营系列电厂的建设实践及成效。韩燕仪(中山大学)剖析了18世纪淮南盐区食盐的流通模式,进而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在商品流通模式上的同异。刘蓝予(北京大学)实证分析了明清时期商帮活跃的地区,其当代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尹秀秀、陈争平(山东大学)梳理了北海银行农贷工作,认为该工作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易星星(兵库县立大学)指出依据银行经营业务构建的全国范围的商业网络与各种社会关系网,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极具特色且非常成功的经营手段。张文、刘威汉(南方科技大学)分析了清末汇丰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

杨在军(河北经贸大学)深入剖析了20世纪30年代潘燕然经营的小商店,并指出商店虽小,但仍按照市场机制运行,且微而不凡。林彦樱(弘前大学)发现中小零售业在日本稳定增长期实现了企业的稳定与存续,是“流通革命”的重要部分。

(责任编辑:高超群)